

杨树达 著

汉书窥管

湖湘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 湖南教育出版社

文库

湖湘

杨树达 著

汉书窥管

湖湘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
湖南教育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汉书窥管 / 杨树达著. —长沙: 湖南教育出版社,
2007.12

(湖湘文库)

ISBN 978-7-5355-5349-2

I. 汉… II. 杨… III. ①中国—古代史—西汉时代—纪
传体②汉书—研究 IV. K234.104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7)第181857号



湖湘文库(甲编)

湖湘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

汉书窥管

著 者 杨树达
责任编辑 符本清
特约编辑 戴 维
责任校对 喻俊新
整体设计 郭天民
出版发行 湖南教育出版社
网 址 <http://www.hneph.com>
电子邮箱 postmaster@hneph.com
地 址 长沙市韶山路443号
印 刷 湖南新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(邵阳)
装 订 湖南新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
版 次 2007年11月第1版 2007年11月第1次印刷
开 本 960×640 1/16
印 张 44.625
字 数 458000
书 号 ISBN 978-7-5355-5349-2/G·5344
定 价 90.00元

ISBN 978-7-5355-5349-2



9 787535 553492 >

《湖湘文库》编辑出版领导小组

顾 问	张春贤	周 强	杨正午	周伯华	胡 彪
	肖 捷	许云昭	戚和平	谢康生	文选德
	孙载夫				
组 长	蒋建国				
副组长	郭开朗	王汀明			
成 员	李凌沙	姜儒振	吴志宪	李友志	刘鸣泰
	朱建纲	龚曙光	金则恭	朱有志	刘献华
	钟志华	刘湘溶	彭国甫		

《湖湘文库》编辑出版领导小组办公室

主 任	刘鸣泰	朱建纲		
副主任	李凌沙	吴志宪	田伏隆	王新国
	尹飞舟	龚曙光	唐浩明	
成 员	唐成红	曾鹏飞	毛良才	刘国瑛
	陈壮军	王德亚		

《湖湘文库》编辑出版委员会

主 任	文选德			
第一副主任	刘鸣泰			
常务副主任	张光华	彭国华	张天明	
副主任	熊治祁	夏剑钦	朱汉民	曾主陶 黄楚芳
委 员	李建国	丁双平	汪 华	刘清华 黄一九
	彭兆平	周玉波	雷 鸣	王海东 韩建中
	谢冠军	杨 林		
装帧设计总监	郭天民			

出版说明

湖湘文化源远流长，博大精深，是中华文化中独具地域特色的重要一脉。特别是近代以来，一批又一批三湘英杰，以其文韬武略，叱咤风云，谱写了辉煌灿烂的历史篇章，使湖湘文化更为绚丽多彩，影响深远。为弘扬湖湘文化、砥砺湖湘后人，中共湖南省委、湖南省人民政府决定编纂出版《湖湘文库》大型丛书。

《湖湘文库》编辑出版以“整理、传承、研究、创新”为基本方针，分甲、乙两编，其内容涵盖古今，编纂工作繁难复杂，兹将有关事宜略述如次：

一、甲编为湖湘文献，系前人著述。主要为湘籍人士著作和湖南地区的出土文献，同时酌收历代寓湘人物在湘作品，以及晚清至民国时期的部分报刊。

二、乙编为湖湘研究，系今人撰编。包括研究、介绍湖湘人物、历史、风物的学术著作和资料汇编等。

三、乙编中的通史、专题史，下限断至1949年。

四、甲编文献以点校后排印或据原本影印两种方式出版。

五、除少数图书以外，一律采用简体汉字横排。

六、每种图书均由今人撰写前言一篇。甲编图书前言，主要简述原作者生平、该书主要内容、学术文化价值及版本源流、所用底本、参校本等。乙编图书前言，则重在阐释该研究课题的研究视角和主要学术观点等。

七、对文献的整理，只据底本与参校本、参校资料等进行校勘标点，对底本文字的讹、夺、衍、倒作正、补、删、乙，有需要说明的问题，则作出校记，一般不作注释。

八、甲编民国文献中的用语、数字、标点等，除特殊情况外，一般不作改动。乙编图书中的标点、数字用法、参考文献著录规则等均按现行出版有关规定使用和处理。

《湖湘文库》卷帙浩繁，难免出现缺失疏漏，热望社会各界批评指正。

《湖湘文库》编辑出版委员会

前言

杨逢彬

杨树达先生（1885—1956），字遇夫，号积微，湖南长沙人。父名孝秩，字翰仙，笃厚勤学，喜读史籍和唐宋古文。遇夫先生5岁时从父读书，对训诂学和史学尤有兴致。

清朝末年，河山日蹙。甲午战争后，遇夫先生“睹父兄愤慨之诚，即切同仇之恨”。12岁，与伯兄芑诒（名树谷）先生一同考入陈宝箴、黄公宪、熊希龄、谭嗣同等合力创办的湖南时务学堂，与蔡锷、范源濂等同在第一班，从梁启超学习《孟子》《公羊传》，接受了梁所倡导的民权革命思想。1900年，入求实书院肄业，开始钻研郝懿行《尔雅义疏》、王念孙《广雅疏证》，始有志于训诂之学。15岁，受业于叶德辉、胡元仪，学问日益精进。1902年17岁时，仿阮元《诗书古训》治《周易》，辑成《周易古义》一书。1903年应观风考，以第一名录取。旋入校经堂肄业。1905年，派往日本留学，入东京宏文学院大冢分校。同时入正则学校学习英文。1908年考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，次年3月毕业，派入京都第三高等学校。时湖南留日学生多人速成班学法政、经济。遇夫先生受同县友人杨怀中（昌济）影响，决心系统学习“欧洲语言及诸杂学”。曾欲赴美国留学，不果。在日期间，加入杨怀中发起的“中国学会”。

遇夫先生学习外国语言，对文法和语源最为用心。曾说：“余

之治中国文法也，资于欧洲文法者多。”又说：“我研究文字学的方法，是受了欧洲文字语源学（etymology）的影响的。”

武昌起义后，杨遇夫先生返国，在长沙各校教授中国文法与英文。1918年3月，南北交讧，南帅谭浩明夜遁，市井一片狼藉；因念《老子》“天地不仁，以万物为刍狗”及“兵者，不祥之器”诸语，于27日，始撰《老子古义》。《周易古义》和《老子古义》的撰作，是遇夫先生著书立说的开始。五四运动前后，遇夫先生是湖南新文化运动的关键人物之一；他与湖南教育界陈润霖、朱剑凡等一道发起“健学会”，响应新潮。北洋军阀张敬尧祸湘，毅然参加驱张运动，并和罗教铎一起被推举为教职员代表，与公民代表毛泽东、熊梦飞及学生代表多人共同赴北京请愿。驱张之后，他即在北京任教，先是在北京师范大学，后在清华大学。从此，遇夫先生开始了“持短笔，照孤灯，先后著书高数尺，传诵于海内外学术之林，始终未尝一藉时会毫末之助，自致于立言不朽之域”（陈寅恪语）的学术生涯，而巍然成为“一代儒宗”（陈寅恪语）。

遇夫先生治学，成果颇丰。他在语法学、修辞学、训诂学、语源学、文字学、古文字学、古文献学、考古学等诸方面均卓有建树，在上述各个领域，他的著作都被公认为经典之作。正因为如此，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，便赢得了极高声誉。张岱年先生在《大公报》上撰文，谓当时中国学术，只有冯友兰之哲学，陈垣之史学，杨遇夫先生之训诂学，足以抗衡日本。1942年，他当选为教育部首届部聘教授。1948年，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。解放后，被评为一级教授，1955年，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首届学部委员。大约在同一时期，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。苏联科学院共有院士和通讯院士200多人，通讯院士中有外国学者

20—30人，当时中国学者当选的只有遇夫先生一位。

至抗战爆发前，杨遇夫先生在北京任教共17年。这期间，其学术研究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，前一阶段大致是1930年以前，以汉语语法研究为主，后阶段是1930年后，侧重于语源学、训诂学、文字学的研究。此外，还兼及修辞学、古文献学及考古学。

前一阶段主要有语法著作4种：《中国语法纲要》《马氏文通刊误》《高等国文法》《词诠》。《中国语法纲要》出版于1928年，是我国较早的一部关于现代汉语语法的著作，在语法史上有重要意义。《马氏文通刊误》肯定《文通》是马建忠“用欧洲科学方法于吾国之第一部著作”，“功不可灭”；同时指出马氏“以他国文法填入中文，不免削足适履，失却中文本来之面目”。《高等国文法》是《马氏文通》之后最重要的古汉语语法著作，在汉语语言学史上有着重要地位。遇夫先生说：“余著《高等国文法》本为修正马氏而作”，“采欧西方法”“要以保存国文本来面目为期”。《词诠》是《高等国文法》的姊妹篇。书中取古书中常用虚词470多个，首别其词类，次释其义训，再举例说明之。该书取刘淇、王引之、马建忠诸家之长，丰富而发展之，又融合了文法和训诂，将字典式体例与文法学体例的优点综合加以利用。“在体例上为后人提供了成功的范例”；“在义项上，为后学提供了综合的基础”；“在例句上提供了丰富的材料”。到目前为止，已重印20多次，约发行30万册，是文言虚词著作中影响最大的著作。

进入三十年代后，遇夫先生开始将大部分精力用于语源学、训诂学、文字学的研究。这一时期的力作是《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》，该书和其姊妹篇，五十年代出版的《积微居小学述林》，乃是他治语源学、训诂学、文字学的代表作。

京华17年，是遇夫先生一生中成果最丰硕的时期。这一阶段

的著述还有《说苑新序疏证》《盐铁论校注》《汉书补注补正》《汉代婚丧礼俗考》《战国策集解》《古书句读释例》《积微居文录》《论语古义》《群书检目》《淮南子证闻》等，平均每年一书，连一向以勤于治学著称的余嘉锡先生也为之惊叹：“吁，多矣哉！非兼人之力不致此！”

4

上述著作中，《汉代婚丧礼俗考》《汉书补注补正》二书是遇夫先生多年治《汉书》的结晶。前者是他关于汉代典章制度和民俗研究的成果，不但是研究汉代文化史的必读书，同时对考古学、民俗学、人类学、社会学以及历史学的研究具有极高参考价值。而后者更为遇夫先生赢得了“汉圣”（陈寅恪语）的美誉，也使得他在1933年即成为清华大学继陈寅恪之后的第二位国文、历史两系合聘的教授。《汉书窥管》一书是《汉书补注补正》的增补本，它代表着遇夫先生治古文献学的最高成就，也被公认为《汉书》文献整理的两大名著之一。《湖湘文库》之选定它，正基于此。

《中国修辞学》是先生所撰《古书疑义举例续补》的进一步系统化和科学化。它是民族形式与科学内容完美结合的典范。郭绍虞曾借用陈寅恪称颂《汉代婚丧礼俗考》的话赞誉此书为修辞学“辟一新途径，树一新楷模”。《中国修辞学》一直被认为是我国修辞学领域两大流派中民族形式派的代表作。

正当遇夫先生沉浸在作学问的快乐之中的时候，日本侵略的步伐日渐加速了。作为深具民族自尊心的学者，遇夫先生多次表明了他的态度。一位日本人请他题字，他以“恃德者昌，恃力者亡”八字付之。抗战发生后，遇夫先生受聘于国立湖南大学。翌年，举家随校迁往湘西小县辰溪之龙头坳。

抗战期间，陈垣先生在沦陷的北平写作《通鉴胡注表微》，表彰胡三省的民族气节和爱国精神；而杨遇夫先生也在大后方的荒

山野岭中编撰了一部《春秋大义述》，激励军民努力抗战，驱除敌人。

值此山河破碎之际，遇夫先生为延续民族文化的命脉，不顾年事已高和研究资料奇缺，开始了古文字（甲骨文、金文）的研究。胡厚宣在《五十年甲骨学论著目》中说：“杨遇夫先生以六十几岁的老先生，最后写文章最多，不愧为五十年来甲骨学研究中努力的一人。”遇夫先生的许多甲骨学论文如《释追逐》《释滴》等（均见《积微居甲文说》），至今仍被认为不刊之论。他治金文的成就更高，其心得全部集中于《积微居金文说》（增订本）中。陈寅恪为此书作序说：“寅恪尝闻当世学者称先生为今日赤县神州训诂学第一人，今读是篇，益信其言之不诬也。”这部书是治金文者的必读书，该书总结的释金文的14条方法以及“首求字形之无悟……”的警句，都是学习古文字的研究生必须烂熟于胸的。

5

抗战胜利后，遇夫先生随校复员省垣长沙，任湖南大学文法学院院长。

1949年后，院系调整，遇夫先生任湖南师范学院历史系教授，兼任湖南文史馆馆长。同时，中国科学院语言所虚位以待，拟请他出任所长。此时，他已近七十高龄，患有高血压等多种疾病，左目几近失明，右目视力已降至0.1以下，但每日仍工作十小时以上。在此期间，他撰写了大量论文，其中以考释古文字的论文为大宗；同时他的许多旧著也得以重版，有时一年就出版六七部之多。1955年，《文字形义学》一书脱稿。该书概括了遇夫先生几十年间研究文字学、古文字学、训诂学、音韵学的成果，包含了他的《小学金石论丛》《小学述林》《甲文说》《金文说》诸书的精华。他说：“此书前后经营十余年，煞费心思。自信中国文字学之科学基础或当由此篇奠定。”同年10月，他在北京承担了

科学院哲学所委托的《盐铁论校注》(即后来出版的《盐铁论要释》)一书的撰写任务(抗战前写过一部,原稿失去),11月返湘后,只用了50天,便完成了初稿。十天之后,遇夫先生便与世长辞了。

遇夫先生是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和史学家,在他一生的学术事业中,古典文献的整理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。他的学术活动,自整理文献始,至整理文献终。遇夫先生整理古籍,既采用清代朴学家的办法,又“绳之文法,推诸修辞之理”,故能独步古今。在他的专著中,文献整理实蔚为大国。上海古籍出版社最近出版的共收有他的26部著作的文集中,属于文献整理的,就有《春秋大义述》《周易古义》《老子古义》《论语疏证》《淮南子证闻》《盐铁论要释》《汉书窥管》《积微居读书记》《古书句读释例》《古书疑义举例续补》等10部著作;据我们所知,没有收入这26部著作的,还有《论语古义》《说苑新序疏证》《战国策集解》等。而在这些著作中,用力最勤,成就最高,影响最大的,无疑是《汉书窥管》。

唐初颜师古网罗众说而成《汉书注》,体大思精,学者称善。有清一代,朴学如日中天。其间治《汉书》成就最高者,前有高邮王念孙,后有长沙王先谦。王念孙《读书杂志》之《读汉书杂志》,为清代治《汉书》最精最富者;而王先谦的《汉书补注》,采集清代鸿生巨儒之治《汉书》者,汇为一编,所以号为集大成,而以《地理志》的补辑最为精湛。遇夫先生的景仰高邮王氏,学界皆知;他也曾经在民国初年去长沙东乡的凉塘晋谒王先谦,还在1932年王氏90冥诞时“夜不成寐”,写下了“不废江河吸万流,一灯孤照费冥搜。凉塘谒后成千古,我亦星星白上头”的诗句。但遇夫先生治《汉书》用力至勤,以至不复持本而倒背如流,故能深谙《汉书》行文风格体例,加以具有精深的文字音韵训诂

文法校勘修辞的学养，所以无论对于王念孙，还是王先谦，都心有未洽，而思有所补辑；于是在1924年撰成《汉书补注补正》一书，次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。陈寅恪先生读到《补正》后来信说：“汉书颀家，公为第一”，“汉圣之名，真不虚也”。后来学界称先生为“汉圣”，即缘于此。《补正》出版后，经多次增补，至四十年代任教湖南大学时，更名为“汉书窥管”。“癸巳之岁（1953），僻处麓山，宾朋希简，发奋补苴，遂终全帙。卅年精力，幸资小结。”此书1955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后，学界反响强烈；杨伯峻先生认为，《汉书》至此，已无剩疑。纵有地下发掘，也只能用以补充或证明汉代的史料和史实，恐难推翻遇夫先生所作的考订。马宗霍称该书在学术上“截断众流，直探本始，先儒积疑为之一扫，盖可视为定论”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《汉书窥管》的价值日益凸显，它和后来出版的陈直先生的《汉书新证》一道，一直被公认为是《汉书》文献整理的两大巅峰之作。而陈直先生也说：“在《汉书补注》之后，最近成书者，则有杨树达先生《汉书窥管》，对于训诂校勘，很有参考之价值；在古物方面，亦间有征引。《汉书补注》，不能与之相比。”因而陈书“体例完全仿杨氏《窥管》”。

《汉书》从古至今，学者用力至夥，除前述颜、王、王外，即有清一代，从事于斯者，钱大昭、周寿昌等硕学鸿儒，不知凡几。先生此书，乃鉴于自来诸家，包括一代大师以最博最精著称的王念孙，时有昧于班书行文风格体例，间于东京末造汉语之共时语法词汇语音系统或有未瞭，于是“倾毕生精力，时时泛滥文籍，凡与班书相涉，辄加纂述”，总为斯编。其体例为依照《汉书》篇目，以《汉书》疑难章句为纲，先迳录先儒成说于其下，再下以精确不磨之按语，举凡“不瞭班书古义而误训”，“据前人妄窜而改不误之班书”，“不知班书省略”等，辄以训诂结合校勘，加以

辨正。质言之，这是一部恢弘赡富或不及《读书杂志》，而绵密精湛则有过的读书笔记。作者以博闻强志浩如烟海之文献经典，以炉火纯青之文字音韵训诂文法校勘修辞学养，加以几十年如一日之殚精竭虑从事于斯；论据恰如钱塘江潮，万头俱至；结论又若一轮朗月，绝不支离缴绕。最值得称道者，乃以《汉书》体例以证《汉书》。例如：《金日磾传》：“赏为奉车，建驸马都尉。”王念孙据荀悦《汉纪》和类书，于“奉车”下校增“都尉”二字。先生指出王念孙不知依《汉书》体例，此为探下省略。举《儒林传》《王莽传》及《三国志·魏志·董卓传》之类似文字为证。《儒林传》云：“上于是出龚等补吏，龚为弘农，歆河内，凤九江太守。”“弘农”“河内”下各省“太守”二字。《王莽传》云：“又置师友祭酒及侍中谏议六经祭酒各一人，凡九祭酒。琅邪左咸为讲《春秋》，颍川满昌为讲《诗》，长安国由为讲《易》，平阳唐昌为讲《书》，沛郡陈咸为讲《礼》，崔发为讲《乐》祭酒。”讲《春秋》、讲《诗》、讲《易》、讲《书》、讲《礼》下各当有“祭酒”二字，因下“讲《乐》祭酒”字而省。先生同时征引顾亭林说，指出荀悦《汉纪》与类书绝不可靠，而王氏“对于荀悦的《汉纪》恍若有嗜痂之癖”，往往据之以改不误之班书。词义训释方面，于高邮亦多纠弹。如《谷永杜邳传》：“专攻上身与后宫而已”，王念孙谓“攻”字义不可通，因改为“政”，同“正”，谏也。先生谓《诗·小雅·鹤鸣》“他山之石，可以攻玉”，《毛传》：“攻，错也。”虞翻注：“攻，摩也。”此谓专门摩切上身与后宫也。王氏娴于古训而此处失之，在于过信《汉纪》之故。此等误说，所在多有，而王先谦氏未加抉择，一概录入，理宜在摒弃之列。书中胜义缤纷，多有发覆之论，阅之如行山阴道上，目不暇接。不能一一列举，读者自得之可也。

汉书窥管自序

《汉书》经始于班叔皮，孟坚承业，蕙班补遗，集一门父子兄妹三人之力以成一书，可谓艰矣。其书乍出，马季长一代大儒，伏阁从蕙班受读，为书简奥，略可测知。东京末叶，服子慎、应仲远之伦竞为注释，魏晋以后，释者多家，东晋蔡谟为之集解，书今不存。李唐开国，颜师古承其诸父游秦之业，裒集旧训为之注，一时号为班氏功臣。然至宋世，三刘吴仁杰等纠举违误，剗撻犹未尽也。清代朴学云兴，鸿生巨儒多肆力此书，及其末造，同邑先辈王葵园先生从事采辑，为之补注，奥义益明，地理一《志》尤为卓绝。自是读《汉书》者人手一编，非无故也。大抵清儒治此书者推高邮王氏为最富，亦最精，然已不免疵类。汉末荀悦据班书撰《汉纪》，往往以不瞭班义而妄改，故顾亭林云：荀纪小异《汉书》，必荀非而班是，此有得之言也。高邮王氏识不逮此，往往据仲悦之妄窜，改不误之班书，此其大蔽也。盖高邮虽好学而不肯深思，故所校时有不能心知其意者。兹举二例言之。《郊祀志》曰：“臣望东北汾阴直有金宝气。”师古以汾阴直连读，训直为当，谓正当汾阴，是也。盖气在天空，方所无由确指，故举汾阴而云直，谓当汾阴地面之天空也。高邮驳颜说，以直有金宝气连读，训直为特，则似汾阴地面有金宝气，于事理不可通矣。《金日磾传》曰：“赏为奉车，建骖马都尉。”高邮于奉车下校增都尉二字，不知班氏因下有都尉二字省略也。《儒林传》云：“上于是出龚等补吏，龚为弘农，歆河内，凤九江太守。”弘农、河内下

并当有太守字，因下文太守字省略也。《王莽传》云：“又置六经祭酒各一人，琅邪左咸为讲《春秋》，颍川满昌为讲《诗》，长安国由为讲《易》，平阳唐昌为讲《书》，沛郡陈咸为讲《礼》，崔发为讲《乐》祭酒。”讲《春秋》讲《诗》讲《易》讲《书》讲《礼》下亦各当有祭酒字，亦因下文讲《乐》祭酒省略也。高邮必增都尉二字，不惟不能心知其意，亦暗于全书通例矣。此类误说，理宜在屏弃之列，而《补注》一一逡录，不加驳正，非也。凡著书者称引前人成说，但可翦裁，不宜改易，致失立说人本意，此至要也。然《补注》于此似未注意。《王子侯表》：湖乡、伊乡两侯同名开，金乡、就乡两侯同名不害，四人皆东平思王孙也。陈景云疑湖乡与伊乡同时受封，金乡与就乡亦同时受封，不应彼此同名，当有一误。《补注》改易陈校之文入湖乡侯下，云：此与金乡、伊乡、就乡并思王孙，同时封，不应二人同名，必有一误。如此则将四侯混合为一，同名两起之事实抹杀无余，全失陈氏立说之初意矣。《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》：李谭、称忠、钟祖、眭顺四人并以捕得反者樊并封，李谭封于永始四年七月己巳，称忠封于十一月己酉，钟祖、眭顺同封于七月己酉，钱大昕校谓四人同以得反者樊并封，其封当同月，而《表》记谭封于七月己巳，忠封于十一月己酉，祖、顺封于七月己酉，前后失伦，七月不当记于十一月之后。据《成帝纪》事在永始三年十一月，疑十一二字误合为七，而四年当作三年也。按此钱氏据《成纪》校李谭条下四年四字之误及李谭、钟祖、眭顺三条七月七字之误也。《补注》不置钱校于有四年及七月两处误字之李谭条下，而置于十一月封文并不误之称忠条下，何耶？此又违反钱氏立言之意者也。据《补注》全书观之，葵园先生用心不失审慎，而此二事《补注》愤愤如此，疑先生于诸表假手他人，不及覆校也。余四十年前，偶

读《苏武传》，有“蹈其背以出血”语，心疑背不可蹈，况在武受伤时耶！而师古及《补注》并无说，余因读蹈为训轻叩之蹈，文乃可通。缘此知《补注》篇帙虽富，遗义尚多。时居乡里，设教中学，文卷猥集，改窜需时，意欲精究而不果。嗣后北游，校课清简，于《补注》研读数通，颇能瞭其得失。时时泛滥文籍，凡与班书有涉，辄加纂述，岁月稍久，记述遂多。初于北方大学讲授班书，倭寇之变，适返里门，旋亦设教于大学。尝先后取所记粗事印布，未竟全书。癸巳之岁，僻处麓山，宾朋希简，发愤补苴，遂终全帙。卅年精力，幸资小结。稟质顽愚，见闻苦陋，管窥蠡测，差误必多，大雅宏达，进而教之。

一九五五年五月十日树达书于岳麓山之耐林廨